

李大钊对列宁个人经历的认识

贾伟龙, 韦 磊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 北京 100044)

摘要:李大钊撰写了多篇关于列宁的文章, 在一些文章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列宁的成长经历及革命经历, 体现了李大钊对列宁的崇敬之情。从中可以看出, 列宁的一些经历与李大钊颇为相似, 尤其是在“家庭精神”、简朴生活和办报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同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列宁与李大钊在个人经历方面都展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奉献终身的大无畏精神。

关键词:李大钊; 列宁; 个人经历

中图分类号:D231;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2)01-0009-07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2.01.002

Li Dazhao's Understandings of Lenin's Personal Experiences

JIA Wei-long, WEI Lei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for Party History and Building, Party School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wrote many articles about Lenin, which introduced Lenin's family, growth and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in details. In addition, Li Dazhao's reverence for Lenin was also included there. From these articles,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ir experiences had something similar, especially for the “family spirit”, simple life and Marxism dissemination through newspaper. Both as the main founder of Marxist proletariat revolutionary party, Li Dazhao and Lenin demonstrated the excellent characters of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and the dauntless spirit to devote their whole life to the revolution.

Key Words: Li Dazhao; Lenin; personal experience

国内学者在“李大钊与列宁的关系”研究上, 大多集中在列宁主义对李大钊的思想影响方面^①, 但就列宁个人经历对李大钊影响方面很少涉及。1921年7月1日, 李大钊在《新青

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的去及现在》一文, 文中“建设新俄罗斯的中心人物的履历”部分对列宁的家庭成长经历和革命经历等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尽管有学者考察发

作者简介:贾伟龙(1995—), 男, 山东滨州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① 例如, 在1959年, 戴鹿鸣在《“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一文中指出: 李大钊“民族自决”“民族解放”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部分”的思想正是来源于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1991年, 朱成甲在《正确理解和评价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一文中指出: 李大钊与其他同时代人比较,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把握更完整和准确, 与列宁的论述具有一致性。

现“列宁履历”部分是李大钊对几部英文文献的翻译^①,但是李大钊在翻译介绍的过程中显然有所取舍,并且对有些内容作了整合,因此这篇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李大钊的观点。研究李大钊对列宁的一些认识,对于研究早期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及如何培养有品格的共产党人具有重要意义。

一、李大钊对列宁成长经历的认识

(一)关于列宁的“家庭精神”

在译介中李大钊特别介绍了列宁的“家庭精神”。

第一,列宁的“家庭精神”是指一家人相亲相爱的精神。李大钊在《俄罗斯革命的去及现在》一文中叙述道:“他们的家庭俨成一个小的大学校。这样一个有趣味的团体,自然生出一种亲热的家庭精神来,兄弟姊妹都相相爱并都亲爱他们的父母,感情异常的深厚。”^{[1]405}从李大钊的译介中可以看出,列宁的家庭培育出了一种不同于一般家庭的“家庭精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家和万事兴”的思想,这种良好的家庭氛围让列宁一家人彼此之间都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

第二,列宁的“家庭精神”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精神。李大钊认为,列宁的家庭是幸福安宁的,但是“他们自己家庭生活的甘美和那呻吟在帝王虐政下万家生活的愚暗与不幸,恰是一个绝好的对照,万众的愁云遮盖了一家美爱自由的光景。所以随着他们求得知识的热情,他们对于人民的热情亦开始增进,一个跟着一个的都自献身于工人农民的解放和教育的事”^{[1]406}。在李大钊看来,列宁也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渴求接受解放人民的知识。从李大钊关于列宁及其兄弟姐妹对工人、农民的关注和为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李大钊肯定了列宁的“家庭精神”中蕴含着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精神。

(二)关于列宁的生活经历

第一,艰辛的求学之路。列宁在求学时曾辗转多地,甚至曾被喀山大学驱逐出校,还曾在彼得堡大学以校外生的身份学习,求学之路十分艰辛。列宁没有上过小学,上中学之前一直是母亲在教他。1887年,列宁考入喀山大学法律系。“法律系是当时喀山大学开设的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惟一的一个系”^{[2]25},在此,列宁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大钊对列宁在喀山大学时的状况是这样译介的:“他在此处的生活为时极短,因他在大学中宣传社会主义并参加革命示威运动被逐出校。”^{[1]408}李大钊此处译介有待商榷,据学者研究,列宁参加学生集会并向校长提交了退学申请,后来才被开除出学校,并被驱逐出喀山。1890年,列宁以校外生的身份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于1891年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李大钊介绍道:“在彼得堡大学肄业的期间,发布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声誉顿起。”^{[1]408}李大钊认为,此时的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经查阅,李大钊在这里所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就是著名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从李大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列宁求学之路虽坎坷,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却非常显著。

第二,简朴的生活。无论是在苏俄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列宁都践行简朴生活。李大钊认为,列宁在担任布尔什维克党领袖期间,仍愿与劳苦大众过同样的日子,“俄国自革命后,非常困苦,常人只有一餐过日,列宁同志也一样”^{[3]511}。李大钊谈道:“列宁同志自被人枪击后,病中须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但还没有两百元,其刻苦俭朴精神,真可为吾侪国民革命者的模范!”^{[3]511}列宁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成为继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巨人,能够

^① 王磊在《李大钊作“列宁履历”译文底本考》一文中考证,李大钊作“列宁履历”的大部分内容是对《列宁:其人其事》《布尔什维克俄国:一项哲学的审视》和《苏维埃俄罗斯》等著作的翻译整合。

领导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离不开他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钻研和对世界的观察。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列宁的身体也逐渐垮掉。虽然列宁的薪资不足以维持他病中的生活,但他还是凭借超人的意志力继续坚持工作。李大钊认为,列宁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甘愿牺牲的品格和对简朴生活的推崇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学习。

二、李大钊对列宁革命经历的认识

(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第一,列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列宁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工人群众进行理论宣传和教育。列宁曾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4]李大钊对列宁革命经历中的这一特点十分重视,他译介了列宁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状况。李大钊指出:列宁在起初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中“只在教育工人们以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事业上尽力”^{[1]408},并未和他的长兄一样参加革命运动。而且李大钊认为,列宁致力于社会主义宣传与普列汉诺夫有着莫大的关系,“一八九五年他往 Geneva 与 Plekhanov 发生关系,旋即返圣彼得堡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与宣传,用 Tunine[Tulin]的名义发表”^{[1]408}。李大钊还译介了列宁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情况。因为早在 1892 年,“列宁组织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小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凡是能够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小组都进行了研究和宣传,对伏尔加河流域的进步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青年特意从萨拉托夫、喀山及其他城市赶来学习新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2]45}。李大钊介绍,在这个时期,列宁“对于学理和对于生命一样的有热情,并且专心一意的作社会党人运动的事业”^{[1]408},后来列宁“组织了手[劳]工阶级解放联合会,他就变成一个有势力的工人首领”^{[1]408}。李大钊认为,列宁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对于成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列宁通过办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列宁非常重视办报方式,这一点也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李大钊指出:“一九〇一年他同 Plekhanov、Martov、Zasulich、Axelrod 诸同志创立了一个报社,名为 Iskra,译云《火花》。这报成立后,就成为亡命在外的俄罗斯社会党人流[活]动的中心。列宁在这个热烈的革命家团体里增进了很多组织的能力,所有加入解放运动的青年都来集合于这个中心,所有在俄国境内革命的宣传都是由这个中心发动。”^{[1]409}虽然李大钊得到的信息并不是很准确,因为《火星报》(即 Iskra)是列宁与其他同志在 1900 年创办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李大钊对《火星报》在当时重要作用的认识。李大钊认为,以列宁为主的社会民主工党人创办的《火星报》不仅能够吸收思想比较先进的青年,而且对当时俄国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李大钊还介绍了列宁创办《前进报》等报刊的情况。列宁“刊行了一部《经济学研究》的书,在俄国销行很广。他用以他这部书卖得的余钱,并赖 Lunacharsky、Bogdanov、Vorovsky 诸人的助力创了一种报,名曰《前进》(Forward)”^{[1]410}。1905 年后,在受到俄国国内反动力量限制的情况下,列宁逃往国外,在芬兰、瑞士、法国等地活动。在逃亡期间,“他又创立了两种报:一名《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是一个宣传的机关;一名《无产阶级》(The Proletariat),是一个学理的刊物”^{[1]410}。虽然在介绍办报的时候,李大钊获得的信息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前进报》是列宁 1905 年 1 月 4 日在日内瓦创办的,但是李大钊用了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列宁办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过,足以看出李大钊十分赞同列宁通过办报的方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

(二)列宁在社会民主工党内的革命经历

第一,列宁在社会民主工党初期的经历。李大钊在《俄罗斯革命的去及现在》一文中介绍了列宁遭流放的情况。列宁在“一八九六年因组织社会民主党为法庭所控被捕,一八九七

年一月二十九日俄皇下了一道谕旨,把他发往西伯利亚去了”^{[1]408}。李大钊特别说明了流放对于列宁进行深入思考的意义,“他同着千万个最勇敢最优良的俄罗斯少年,经长途远越亚细亚的荒微去了,但他决不令这一片冰天雪地沉沉的西伯利亚于他没有什么意义。他想在这个地方,正可以有很富的机会让他去思去读。他在 Irkutsk、Krasnoyarsk 等处过了他的逐放期间,当他在 Sushenskoy 的村落里的时候,他曾自励用脑与笔不断的工作,所以他从此出来以后,有好多的著作出世,用 Ilyich、Ilin、Tyline [Tylin]、Lenin 等名义发表”^{[1]408-409}。从“自励”二字中可以看出,李大钊对列宁在如此窘迫的境遇中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且付诸实践的精神是十分崇敬的。

第二,列宁与社会民主工党的内部分裂。李大钊还译介了列宁与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裂的情况。1903 年,社会民主工党“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列宁主张把该党改为中央集权的组织,由一个中央集权体指导一切运动。他力持此说,争论甚激,该党因而分裂成为二派:列宁一派为多数派(Bolsheviki);反对列宁的一派为少数派(Mensheviki)”^{[1]409}。社会民主工党形成两个派别的主要原因是列宁与马尔托夫在接收什么样的党员和建设什么样的政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布尔什维克派的出现,标志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列宁主义的诞生。正如列宁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2]122} 1904 年,“列宁在是年的会议提出很多的问题,如那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家财产没收、革命运动发展至于极度、俄罗斯革命是全世界国际社会主义者革命的乐令等等问题,都是可以决定他后来作劳农政府的领袖的”^{[1]410}。李大钊认为,列宁提出的这些问题加剧了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分裂,决定了后来列宁能够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以及俄国的领袖,因为列宁以敏锐的洞察力结合马克思主义提出并解答了俄国将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能够走上这条道路等问题。

(三)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革命经历

第一,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立场。李大钊在文章中说明了列宁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以清醒的头脑揭示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本质以及要实行何种制度。列宁“屡屡赞扬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他以为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此方法的妙处,在以人民代表美名之下,使此机关仅为饶舌的机关,为中产阶级装璜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列宁氏以为欲救此弊,要在使代表机关不但为言论机关,并须为实行机关”^{[3]104}。通过李大钊的文章可见,俄国资产阶级政府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完全相悖的,资产阶级政府是虚伪的、剥削的、少数人的政府,而布尔什维克要建立的是反对剥削的、代表多数人意志的无产阶级政府和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列宁对于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以后的革命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列宁回俄,担任领袖。李大钊描绘了列宁 1917 年回国时的场景。“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间,俄皇倒后,他很想回国,但协约国政府很反对他回俄国。亏得瑞士社会党人的计划,费了许多周折,才得经由德国回俄,随着他来的有一百多革命党人,其中有很多的社会革命党和少数派,著名的像 Axelrod、Martov 等亦都在内,他们是反对列宁和多数派的最有力的人物。他到俄都的那一天,陆海军人和一般人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典礼,从此他的生涯就和俄国的大革命混在一处了。”^{[1]412} 列宁回国的具体时间为 1917 年 4 月 16 日,“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广场和附近的街道上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和水兵唱着革命歌曲,手擎熊熊的火炬和写有‘向列宁致敬!’的旗帜,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着自己领袖的归来”^{[2]250}。这与李大钊所描述的场景相差无几。通过对列宁回国场景的描述,李大钊说明了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深受全国多数人民的爱戴,甚至连以前反对列宁主张的少数派都非常愿意让列宁回国领导革命。虽然列宁多年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但是俄国

人民对列宁流露出来的崇敬之情是极其明显的,后来列宁成为俄国革命的领导人、成为国家领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第三,列宁晚年在党内的工作经历。李大钊在谈到列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时是这样说的:“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3]514} 1918年,列宁在莫斯科讲演结束后遇刺,有两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身体,这次遇刺给列宁的身体造成了严重影响,后来多次因枪伤而头痛。虽然列宁在晚年饱受疾病折磨,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工作,1921年“8月9日,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承认自己‘累的精疲力竭’”^{[2]432}。列宁的身体状况虽然非常不好,但在1923年之前还一直主持着苏联党和国家的工作,直到1923年3月10日,“列宁的病第三次严重发作,完全丧失了说话能力和工作能力”^{[2]439}。因此,从李大钊对列宁的评价中可以看到,列宁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李大钊对列宁这种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和工作态度十分敬佩。

三、李大钊与列宁经历上的相似之处

(一) 成长经历

第一,“家庭精神”。如前所述,李大钊在介绍列宁的家庭成长经历时,专门说明了其一家人相亲相爱以及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家庭精神”。这种精神在李大钊自己的家庭生活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李大钊自幼失去双亲,由祖父李如珍抚养。“为了让李大钊健康成长,李如珍还特别注意培养孙子的好品德和进行人格教育……李如珍要求李大钊从小就坐有坐相,站有站相,通情知礼,以儒家的修身典式要求自己。”^{[5]11}正是由于祖父的悉心教导,李大钊才得以在失去双亲的情况下茁壮成长,并且明白了一家人相亲相爱的重要性。在李大钊被捕入狱期间回忆起过去的时候,他提到:“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6]297}李大钊及其夫人主动承担起了赡养祖父的责任,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而且更反映出李大钊一家人相亲相爱的和睦关系。据王一

知回忆:“他们夫妇感情很好,大钊同志对李夫人关怀体贴,李夫人为了支持大钊同志的工作,日夜辛勤劳动。”^{[7]102}李大钊不仅与妻子感情很好,而且据李星华回忆,在她小时候,父亲李大钊教她和哥哥唱歌、和他们一起扫雪、教他们临帖等,一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李大钊的祖父“敢于面对潮流,迎接挑战,抓住发展机遇,其关键决策就是为经商而勇于走出关外”^{[5]12},并且“不仅为本族人立功立德,而且还为本村人造福”^{[5]8}。这种勇于挑战、敢于改变和为他人谋福利的精神无疑对李大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李大钊有了孩子以后,也十分注重向孩子们灌输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据李星华回忆:“他当年在雨天里踏着风琴教我们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8]145-146}在回忆李大钊牺牲的时候,李星华谈道:“父亲的英勇形象,他的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印在我的脑际,深深地教育着我,鞭策我前进。”^{[8]206}足见李大钊家庭中的这种革命精神和为人民求解放的精神对其后辈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第二,教育经历。列宁的求学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其求学之路也是异常艰辛的。李大钊幼失怙恃,祖父“李如珍读过书,喜欢看《三国演义》一类小说,有能力承担起孙子的识字启蒙”^{[9]11}。六岁之前,李大钊是靠着祖父的教育来识字的。李大钊六岁时,“祖父把他送进本村谷家私塾”^{[9]12}。李大钊经历了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的改制,最后进入了永平府中学堂。在永平府中学堂,“他开始接受新学,主要是英语、数学和西方的政治、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知识”^{[5]34}。李大钊在这一阶段的学习,对他打开视野有着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决定去天津求学,依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李大钊和列宁一样是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求学的,这为锻造他们二人不屈的个人品格起着重要作用。对比李大钊与列宁的教育经历可发现,二人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李大钊提到“一八九一年,列宁入彼得堡大学研究法律经济”,而在1907年,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

专门学堂。1914 年 9 月,李大钊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部。在早稻田大学的第一学年,李大钊学习的课程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应用经济学、经济学原理、近代政治史、民法要论、刑法要论、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及英文练习、日语作文等十余门;第二学年学习的课程有国法学、行政泛论、政治学史、社会政策、英文练习(社会学文献讲读)等。可见,李大钊的教育经历与列宁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即二人都曾学习过政治、法律、经济等课程。

此外,李大钊与列宁二人都有在大学退学的经历。究其原因,二人都是因为本民族和本国人民谋出路、求解放而被迫退学的。如前所述,列宁在喀山大学期间,撰写《告喀山全体大学生书》,组织学生团体,参加集会活动,后来向学校提交了退学申请,并且在被捕入狱后曾说“我的哥哥已经为我开辟了一条路,就是进行革命斗争”^{[2]29},最后他被驱逐出校。李大钊在“1915 年末 1916 年初,为联络讨袁事宜临时回到上海,又于‘丙辰春’返回东京。此后离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住到东京郊外高田村月印精社,从事《民彝》杂志的编辑和《民彝与政治》、《青春》等文的写作……其激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字见诸报章,当然不会得到校方宽容”^[10],随后,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开除学籍。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不仅为国内革命事业在中日之间来回奔走,并且在日本担任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人,为了宣传新思想、开阔中国人民的眼界,撰写多篇启智和抨击类型的文章,因此可以说李大钊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谋出路、求解放而不得已被迫退学的。

第三,提倡简朴生活。对于列宁的病中生活,李大钊是这样描述的:“列宁为主义而遭狙击,连年卧病,其薪酬之薄,至不足以维持他的病中的生活。国家虽屡为增加,而迄死之日,每月薪俸终不过二百元左右。就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惭愧无地。”^{[3]514-515}这足以看出李大钊十分赞赏列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钦佩列宁勤俭节约和不以自己

领袖身份向人民索取利益的优秀品格。众所周知,李大钊也是简易生活的积极提倡者,早在 1917 年,他在《甲寅》日刊中发表了《简易生活之必要》一文,文中称:“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消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务使自己现有之精力、物质,克以应与己缘接而生之要求之负担,绰有余裕,而后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间,全无所于愧怍也。”^{[11]171}李大钊认为,简朴的生活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能够使人保持正气,少犯甚至不犯错误。李大钊对人的修养以及对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李大钊不仅在文章中提倡过简朴生活,而且在现实中也确实是一个积极的简朴生活实践者,据罗章龙回忆:李大钊“平日一如北方人的简单生活,一个大饼,一根葱,粗茶淡饭就满足了”^{[7]53};李大钊在苏联访问期间“仍如往常在国内一样保持朴素生活,着普通衣,穿桦皮鞋(苏联人以桦树皮所做的便鞋),自己打扫房间,接待各国来访客人,经常谈至深夜,待客人走后埋案继续写文章和通讯,生活非常清俭”^{[7]54}。

(二) 革命经历

第一,注重通过办报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列宁十分注重通过报刊对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和动员。这一点,在李大钊关于列宁革命经历的译介中就有所突出。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大钊也非常注重通过办报的方式传播新思想。李大钊在 1916 年回国后,担任了《晨钟报》的编辑主任,不久又出任了《甲寅》的主笔。1918 年,他又与陈独秀等轮流担任《新青年》的编辑,并且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年末,为适应当时的宣传形势,创办了篇幅短小精悍、注重批评时政的《每周评论》。1919 年,李大钊出任《晨报副刊》的主编,并把《晨报副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其中,1918 年 7 月 1 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 3 册上发表了《法俄革

命之比较观》。在这篇文章中,他得出了“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的结论,赞扬了俄国十月革命,预测了世界革命的发展趋势。1919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了《Bolshevism的胜利》,喊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1]367}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口号。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中国人民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思想等,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范本。李大钊在创报发刊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的文章,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呕心沥血。列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即使在晚年疾病缠身,他也没有放弃理想和工作。列宁这种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奉献终身的精神对李大钊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大钊多次对列宁表达了敬佩之情,称列宁是“一位仁慈忠勇献身于全人类的人”^{[3]514}。李大钊在对待革命事业的时候也同样如此。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建早期党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四处奔走演讲,直至最后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6]301}李大钊即使身陷囹圄,也仍不忘自己为民族求得解放的雄心壮志,仍想为广大的革命青年求得生存和发展。李大钊壮烈牺牲时年仅38岁,面对敌人的绞刑架他大义凛然、不屈不挠、视死如归。1927年5月7日,《北洋画报》刊载了《处决李大钊等琐闻》,文中

描述:“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己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行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行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12]1927年5月8日,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发表《悼李大钊同志》一文,文中写道:“李大钊同志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又是国民党的政治会议一委员,他是最勇敢的战士,为推翻一切反动势力而奋斗。”^[13]维经斯基对李大钊的牺牲无疑非常震惊和痛惜,并且在文章中深深地表达了对李大钊的崇敬之情。李大钊的牺牲对当时的共产党人影响颇大,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被每一代共产党人所称颂,也为每一代共产党人树立了标杆。

四、结语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创建者。他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转变为伟大实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对俄国、对列宁给予了高度关注。李大钊早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就曾指出,对于战胜德国军国主义“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马克思(Marx)的功业”^{[11]363}。李大钊在开始宣传十月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列宁,因此,李大钊对列宁个人经历的研究也是十月革命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的个人经历是李大钊关注的第一个重点,并且列宁的建党思想、帝国主义论及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等对李大钊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李大钊很快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在李大钊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如李大钊曾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下转第72页)

- [5] JAIN N. A separate law for peacekeepers: the clash between the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J].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5, 16(2): 239 - 254.
- [6] 强音.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局限性的思考[J]. 南阳理工学院学报, 2013, 5(1): 22 - 25.
- [7] 高铭喧, 王俊平. 中国关注的国际刑事法院问题[J]. 人民检察, 2007(7): 5 - 9.
- [8] 杨宇冠.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探究: 以利比亚情势为视角[J]. 北方法学, 2012, 6(2): 72 - 78.
- [9] HASSAN S.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nd the role of USA: a legal appraisal[J]. Norther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2014, 1: 51 - 69.
- [10] MARECHA K, CHIGORA P. The Sudanese conflict: war crimes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J].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1(4): 37 - 49.
- [11] 张贵玲.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分析[J]. 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8(4): 121 - 126.
- [12] ZIMMER M B. Book review: The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urt Administration, 2014, 6(2): 112.
- [13] 徐俊俊.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运作与现实挑战[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17(1): 80 - 82.
- [14] 罗国强.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与执行权问题: 评苏丹总统逮捕令事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5(2): 39 - 44.
- [15] 朱樱. 论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挑战[J]. 理论观察, 2014(1): 64 - 65.
- [16] 段琼.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延展下的非缔约国[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S1): 171 - 173.

(责任编辑: 李秀荣)

(上接第 15 页)即是社会主义团体。”^{[1]348-350}通过对列宁个人经历的介绍, 李大钊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列宁的精神品质。同时, 通过介绍, 也体现出李大钊对列宁的崇敬之情, 并且试图以列宁的精神品质教育、引导中国人民。与此同时, 在李大钊其后的革命经历中, 也处处展现出列宁对他的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 季正矩. 列宁传[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
- [3]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4]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70 - 71.
- [5] 朱成甲. 李大钊传(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6]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7] 罗章龙. 回忆李大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8] 李星华. 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9] 朱志敏. 李大钊传[M].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9.
- [10] 韩一德. 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的史实考察[J]. 近代史研究, 1989(1): 303 - 311.
- [1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12] 王郎自京师寄. 处决李大钊等琐闻[N]. 北洋画报, 1927-05-07(2).
- [13] 魏琴. 悼李大钊同志[N]. 向导, 1927-05-08(1).

(责任编辑: 李秀荣)